

华中抗日根据地
鄂豫边区
财政经济史

主编 刘跃光 李倩文
副主编 张影辉 蔡德祐



武汉大学出版社

528892



华中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

财政经济史

主 编 刘跃光 李倩文
副主编 张影辉 蔡德祐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7年·武汉

华中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财政经济史

主 编 刘跃光 李倩文

副主编 张影辉 蔡德祐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昌 珞珈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汉阳县印刷厂印刷

*

450×1308 (mm) 1/32 6.875印张 170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50

统一书号, 11279·26 定价, 2.30元

ISBN7-307-00166-7/K·11

序

一九八二年初，武汉大学和中南财经大学刘跃光副教授等十二位同志，受中央财政部的委托，负责编写《华中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财政经济史》一书，并推举原湖北财经学院（中南财经大学的前身）院长洪德铭、湖北省财政厅厅长何福林、湖北省党史征编委员会副主任（原省档案局副局长）魏颖三、原省出版局副局长于溪和我等五人成立领导小组，领导此项工作。中共湖北省委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予以批准。

本书正、副主编刘跃光、李倩文、张影辉三位副教授和原新四军五师老战士蔡德祜等四位同志与其他八位教师，为编写这部史书曾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挤出时间，在几乎全无材料的情况下，跑遍了全国有关单位和部门，访问了原新四军五师和鄂豫边区的一些老干部和战士，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先后挖掘和收集到几百万字的档案和资料，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除已汇编成《华中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财经史料选辑》一书，即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外，现又写成了这部专著。本书从拟提纲到定稿，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并曾邀请当年在新四军五师和鄂豫边区做过财经工作的刘子厚、张旺午、李健等三十余位老同志，开了半个月的座谈会，征求对撰纂此书的意见和核实史料，力求使此书有较好的质量。现在，此书最后经刘跃光、李倩文同志统编定稿，交出版社出版。

目前，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史已公开出版的还是很少的，这本专著总结了当年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借鉴作用。

一九八五年是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中央宣传部号召全国各大专院校与研究单位，编写抗日战争史、根据地建设史、财经史等，论证我党领导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功绩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地位；同时，对全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因此，我期望《华中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财政经济史》一书，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将发挥积极作用。

庄 果

一九八五年十月

（注）庄果同志原系新四军五师老战士，曾任鄂豫边区建设银行总行副行长、武汉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现任中共湖北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

前 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经历了长达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之后，才取得了全国政权的。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前，党就在各个根据地开展了一些可能的和必要的财政经济工作，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财政经济工作经验，并造就了一大批具有丰富经验的财政经济管理干部，不仅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而且也是建国后胜利地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系统地总结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的历史经验，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可以作为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借鉴。

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和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重要基础。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资料十分缺乏，所以编写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的专门著作较少。1982年中央财政部和中共湖北省委委托武汉大学和中南财经大学（湖北财经学院的前身）的刘耀光等十二位教师，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搜集了大量珍贵的档案、资料，进行了反复研究，写成了《华中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财政经济的基本原理和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制定的方针、政策为指导，从华中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总结华中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的财政经济的发展规律、特点和历史经验，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本书采取专题形式，史论结合，每一专题要求把自身的矛盾

运动和历史发展过程反映出来，又要把财政经济各项工作之间互相促进、相互制约的内在联系反映出来，力求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全书分七章。第一章，概论。讲华中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状况，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地财政经济的领导，根据地财政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以及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概貌，是《华中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的总论。它从分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和民族关系入手，阐述如何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政策；又根据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的新变化，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坚持，提出了根据地财政经济斗争的严重任务，从经济结构到民族关系到政治斗争，又回到经济斗争，正确处理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辩证关系，对全书起统帅作用。第二章，财政。讲保障革命战争的物资供给，是抗日战争时期财政的中心任务；财政支援对发展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重要性；对不同阶级实行不同财经政策，对于摧毁旧的生产关系，保护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的重要作用；农业税和税收是边区财政的主要来源，军费支出是最主要的支出；一切为了抗战的需要，配备强有力的干部；建立健全预决算等制度，实行严格的财政管理等。第三章，金融。阐述货币、信贷在根据地支持革命战争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发行边币是维护根据地经济独立、促进生产发展、商品流通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条件之一。根据地建设银行的出现和发展，以建设银行为领导的新信贷体系对促进生产和流通，扶助边区经济发展，支援革命战争方面所起的作用。第四章，减租减息。讲减租减息前的阶级关系，党关于减租减息的方针政策，减租减息运动的发动和发展，减租减息中的斗争和胜利。第五章，农业。讲在减租减息基础上发展农业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迅速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生产力中最重要

因素是人，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特别是实行减租减息之后获得利益的农民为了民族解放积极参军参战，为了解决农村劳力不足困难，实行了变工互助，这些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互助合作形式，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鄂豫边区党委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农业政策，并且用财政信贷支援农业，使根据地的农业得到迅速发展。第六章，工业。讲根据地工业面临的双重任务：一方面发展生产力，创办公营工业，在战争条件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公营工业，主要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自给性的军需工业，同时组织手工业合作社，保护私营工业，使它们为支援革命战争，保障人民物质生活需要服务；另一方面是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师徒关系和劳资关系，实施劳动法，加强政治教育，以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第七章，商业。讲商品交换，特别是出入境贸易对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所起的特殊重要作用。敌人的经济封锁和敌顽的夹击对私营商业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边区贸易的阻滞，扩大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影响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影响了金融的巩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经济，于是建立了反映根据地特点和适合战争需要的新的商业组织——对外贸易局、物资统制局、粮食调剂局、粮食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等。

我们国家今天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它既需要借鉴外国某些发展生产和经营管理的经验，也更需要吸收我们自己过去根据地财政和经济建设中的历史经验。比如，当时在各个根据地所坚持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把农业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发行边币必须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关心群众生活，依靠群众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等等，对我国今天的四化建设来说，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可以作为经济建设的历史借鉴，可以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而且对充分肯定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

本书是经过集体讨论，分工执笔写成的：第一章，张影辉、孔祥征；第二章，杨存厚、王永毅；第三章，赵学禹；第四章，李倩文；第五章，陈伯强；第六章，刘跃光；第七章，樊蕴珍、吴德华；大事记，孔祥征、吴德华；前言，刘跃光、李倩文。最后由刘跃光、李倩文统编定稿。庄果和洪德铭对史稿进行了审阅。

因受条件的限制，这本书不可能对华中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财政经济历史作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而只能根据我们原有的基础和目前研究成果作简单介绍。为进一步开展华中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的研究，起抛砖引玉的作用。由于我们掌握的资料不足，水平不高，加上未更广泛地征求意见，书中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敬希革命前辈和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目 录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概 论	(1)
第二章 财 政	(25)
第三章 金 融	(55)
第四章 减租减息	(72)
第五章 农 业	(103)
第六章 工 业	(127)
第七章 商 业	(147)
附 录 大事记	(173)

第一章 概 论

第一节 边区的自然环境、经济状况 与武汉沦陷后的形势

一、鄂豫边区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

(一) 地理位置

鄂豫边区是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以后，全国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的艰难时刻，中国共产党在中原抗日前哨建立起来的敌后根据地。它是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作出了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坚策，为鄂豫边区的成立指明了方向。会议还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中原局的成立，对清除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发展中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早在中原局成立以前，亦即在武汉沦陷以前，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就派了一批党员干部到武汉外围农村，恢复党的组织，动员和组织群众准备抗日。因而，武汉沦陷前后，在豫南的确山、信阳、罗山，鄂东的黄安（红安）、黄冈、浠水、

黄陂、黄梅；鄂中的应城、应山、汉川、汉阳；鄂西的江陵、钟祥、当阳；鄂南的武昌、鄂城、大冶、崇阳、咸宁；鄂北的随（县）、枣（阳）等地，都燃起了武装抗日的熊熊烈火。

中原局成立后，刘少奇同志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立即作出了中原敌后抗战的战略部署，成立了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以李先念为司令员、周志坚为参谋长，约百余人自竹沟南下，挺进武汉外围敌后，用“滚雪球”的方法，逐步地扩大了抗日战争的力量。从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鄂豫挺进支队——鄂豫挺进纵队及新四军第五师的建立和发展，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全边区已拥有五万多人的正规部队和三十余万人的民兵武装。从日寇铁蹄下解放的国土，已由豫南的竹沟、鄂中的汤池、鄂东的七里坪三个战略基点逐步扩大到东起安徽的宿松、太湖和江西的彭泽，西到湖北的宜昌，北始河南的舞阳、叶县，南至幕阜山麓和洞庭湖畔，跨有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的辽阔地区，包括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三大革命根据地的大部或一部。它拥有九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一千三百多万人口。建立了七个专区，三十九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约五十多个县的游击活动地区（均不包括县城）。这样，在军事上不仅包围了盘据武汉之敌，而且在战略上可东去苏皖直下浙赣；西临川陕为西南屏障；南联湘黔可抵两广；北通冀鲁，绾毂中原，是华中敌后战场的重要战略地区之一。

（二）自然环境

鄂豫边区位于鄂豫交界的湖广盆地，东、北、西三面山脉绵延，俯瞰长江，雄视武汉，地势险要；南部地势平坦，江汉平原居其中，宜于耕种，物产丰富。境内平汉、粤汉两铁路纵贯南北，长江、汉水横亘东西。江河湖泊，星罗棋布，公路密如蛛网，交通十分方便。

在边区境内，有四大山脉，迤邐其间。在平汉路西側：一为大洪山，在湖北的京山、隨县之間，南靠京（山）、钟（祥）公路，抵汉水东岸，北连襄花公路，东至沮水（亦称府河），村落、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尤以米麦为大宗。在军事上处于襄花、京钟公路之間，地势险要，给敌人威胁很大。一为桐柏山，在湖北的枣阳与河南桐柏之間，东起武胜关，西至襄阳附近之双沟，北抵信阳、确山、唐河，南联襄（阳）花（园）公路，周围不下数千里，人口、村落相当稠密，因其周围靠近铁路、公路，一方面易遭敌人包围袭击，但另一方面也可给敌人以严重威胁，成为四面出击敌人之军事据点。在平汉路东側：一为大悟山；在湖北礼山（今大悟县）与河南经扶（今新县）之間，东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之大别山主脉衔接，西至武胜关与桐柏山相连，北靠潢（川）南（阳）公路，南向礼山、黄冈、麻城三县延伸与黄陂县境内之木兰山相联。林木丛生，农产品丰富，因连接大别山、桐柏山，在军事上的价值很大。一为大别山，雄峙鄂、豫、皖三省边界，迄河南商城和安徽金寨、六安，西至河南经扶与大悟山相接，南抵湖北麻城、罗田、英山，东延安徽霍山，为一千公尺以上山地，最高峰天堂岩高达一千七百余公尺。大别山区，山高林密，又无较大公路，不易为敌人进袭。村落稠密，物产丰富，为著名革命根据地。另外还有幕阜山蜿蜒湘鄂边，为鄂南重要游击根据地。上述诸山，相互连贯，居高临下，形成俯视武汉重镇及重要交通要道之雄姿，对人民进行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①

鄂豫边区江河纵横交错，除浩浩荡荡的长江外，在平汉路西境内的有襄河、府河（沮水）、环水、宋河（大富河）、漳水。其中最大的为襄河，主源出于汉中，由白河入湖北境，沿襄樊、荆门、天门、汉川、汉阳至汉口入长江。沿河两岸自襄樊以上多为坡地，河面甚宽，以下则为平原，河面狭窄，但水甚深。

①《鄂豫边区根据地概况》，1942年8月。

沿河两岸盛产稻、棉、麦，如无大的水、旱、虫灾，沿岸的农民可丰衣足食。其次为府河（涇水），发源于大洪山，流经随县、安陆、云梦、孝感、应城至汉川，与襄河汇合入长江。随县以上河面不宽，有的地方可涉水而过，随县以下可通舟楫。两岸为平原，盛产米、麦。环水，发源于平汉铁路东礼山境内，流经花园，沿铁路直入孝感之白水湖，出汉口之苑家，汇合于长江。路西两岸多为圩堤，无险可利用，且靠近铁路，影响我军行动，对军事不利。宋河（大富河）、漳水均发源于大洪山，流程不长，大富河，由京山之三阳店经宋河镇入应城刁叉湖汇合于府河。漳水由京山平坝流经安陆桑树店、云梦胡金店也汇合于府河。两河均可航行一般船舶，两河沿岸平坦，盛产米麦，亦为富庶之地。

在路东有倒水、武湖水，倒水两岸山地居多，地势很好。在河南境内的有淮河和潢水，淮河有舟楫之利，两岸地势亦好，潢水在潢川与淮人间的一段可通大小船只。①

湖北省是我国湖泊最多的省份，有“千湖之省”的称号。鄂豫边区的湖泊在河南境内的不多，而所在湖北的居多。大小湖泊约千余个，多数分布在黄冈以西、江陵以东广阔的江汉平原上，形连体接，川渠交错，水道相通，可行舟楫，也利灌溉。其中以洪湖为最大，面积为四百三十八平方公里，它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群众基础甚好，加之港叉交错，一般说来不便于敌军行动而利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此外比较大的还有洪湖县境内的大沙湖，潜江监利之间的泽源湖、白露湖，孝感汉口间之西湖，黄陂以南之武湖，黄冈以西之张渡湖，应城、汉川、天门间的刁叉湖等。这些湖泊多与长江汉水相通，湖岸滩地广阔，是农业垦殖的主要场所，莲藕、鱼、禽丰富，有利于人民游击队伍的生存和发展。②。

鄂豫边区陆路交通有平汉（粤汉）铁路，纵贯其中。沿路地势花园以北，山峦起伏，花园以南为平原，全长约二百一十公

①②《鄂豫边区根据地概况》，1942年8月。

里。

公路有潢汉、潢南、汉宜、襄花、襄宜等五大干线。潢汉路由潢川经黄陂至汉口，沿路均为山地，地势险要。潢南路由潢川经罗山、信阳、桐柏、唐河到南阳。沿途大半为平原，仅信阳到桐柏间为山地，并多险隘。汉宜路由汉口经应城、皂市、沙洋、当阳至宜昌。全路除皂市至沙洋，当阳至宜昌两段路旁多为小山地外，其余均为平原，此线为日寇进攻我国西南大后方之交通要道。襄花路由花园经安陆、马坪、随县至襄阳。全路是从大洪、桐柏两山中的腹地插过，沿途坡隘较多，是敌人从汉口至随枣及襄樊前线之唯一交通运输线。襄宜路由襄阳北经邓县，南由襄阳经宜城至十里铺，接宜汉路，直达汉口，在军事战略上非常重要。除上述五大干线外，还有密如蛛网的支路，由于线路伸向四面八方，形成纵横交错的公路网。上述交通要道为敌人所利用，对我威胁甚大。

鄂豫边区，特别是随县以东及沿汉水各县为湖区地带，素称鱼米之乡，盛产米、麦、棉；此外还产杂粮、菜籽、黄豆、玉米、小米、花生、茶叶及山货等。丰收之年汉水一带有大批粮食和棉花可资外运，远销武汉、河南、湖南、贵州等地。歉收之年也可自给自足。其它农副产品尚有丝、麻、豆油、菜油、桐油、生漆、皮革、猪鬃、蛋类等。由于盛产米、棉、油籽，故碾米、纺织、榨油等产业在这个地区较为发达。鄂豫边区的矿产有汉阳、大冶出产的煤和铁，应城矿区出产石膏和盐，盐的产量较大，能供给附近八到十三个县的需要，但均被敌人所控制。

鄂豫边区资源丰富，工农业较为发达，军民的穿衣吃饭不成问题。但在军事工业方面，由于敌人控制较严，发展存在着许多困难。总之，鄂豫边区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及经济条件，都充分说明边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它不断威胁武汉之敌，钳住宜、沙大量敌伪，并钳制了敌人打通粤汉铁路的行动。

二、敌顽夹击下的边区政治、军事、经济形势

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后，全国抗日战争转入了最艰难的相持阶段。日寇在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进攻，转向我党抗日根据地进“扫荡”，政治上实行“以华制华”，经济上实行“以战养战”，以达到其灭亡中国的目的。而国民党在日本的“政治诱降”下，而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鄂豫边区根据地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时刻诞生的。当时边区所面临的局面，一面是日寇和伪军，一面是国民党顽军。

日寇经常对我进行军事“扫荡”。他们在武汉及其外围二十八个县的重要城镇屯以重兵。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敌人经常驻守在这里的兵力计有：第三、第四、第六、第十三、第二十九、第四十等六个师团和两个旅团约十五万重兵。敌人沿铁路、公路、长江的市镇及交通要道修筑碉堡，遍设据点以强化其统治，仅在人民武装活动区内设立的据点就有一百四十八个。①日寇还大肆搜罗散兵游勇、民族败类，拼凑伪政权伪军队，如汪步青的伪和平救国军，刘佐三的伪华中剿匪军，李森林的伪保安队等。供其驱使的伪军达八万之众，他们为虎作伥，嚣张一时。一九四零年以后，我边区已初具规模，给日寇以极大的威胁。于是敌人加紧了对边区的反复扫荡，采取几路包围，迂回偷袭，跟踪追击等办法，以求扑灭边区人民军队。敌人还企图将我军压到顽军地区，借顽军之手消灭我军。

鄂豫边区军民在抗击敌伪的同时，还要对付国民党顽军的摩擦。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推行“防共”、“溶共”、“限共”的政策。会后陆续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的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等反动法令，用全副力量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

①任质斌：《新四军五师是怎样成长壮大和完成她的历史任务的》，《战斗在鄂豫边区》。

国民党顽军占据着大别山、大洪山、桐柏山、幕阜山，割断我边区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使我边区长期孤悬敌后。他们在边区周围设置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等四个战区（一九四四年重划为一、三、五、六、九、十等六个战区）。部署的第一线部队共有七个军团，总计约四十万众。在蒋介石反共政策的驱使下，顽军不断向我边区寻衅，制造摩擦。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从一九三九年开始逐年都有“围剿”新四军鄂豫边区部队的计划。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增加到逐月都有围剿计划。国民党顽固派诬蔑抗日的人民军队为“奸匪”，甚至勾结敌伪“围剿”鄂豫边区，在下达命令时竟说：“在剿匪期间应避免与敌决战。”^①

在敌伪顽三方面包围夹击中，边区军民面临着非常艰苦的斗争形势。

这种政治军事上的险恶的形势，给边区经济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由于日寇频繁的军事“扫荡”和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日寇所到之处，人烟稀少，一片废墟。边区人民缺衣少食，啼饥号寒。敌人一方面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断绝敌后我军民生活用品、工业品、军需物资的来源；另一方面，利用奸商高价收购边区的农副产品，谷米、杂粮、棉花、牲畜、油料，不断流向敌占区。日寇破坏边区经济的另一罪行就是破坏币制。日寇不仅在其占领区强行使用军票、伪币、日币，而且将它投掷到边区，企图以日伪钞票压倒留在敌后的法币；同时又千方百计在边区搜括法币、辅币，使边区法币、辅币日益减少。由于金融混乱，法币贬值，影响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与此同时，顽固派也助纣为恶，他们利用国统区对食盐、工业品等物资的统制专卖政策封锁边区，妄图困杀边区军民。他们经常窜到边区抢粮、“借”粮，搜刮老百姓的牲畜，强行圈地拆屋，修筑反共碉堡；他们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巧立名目，敲榨勒索，扼杀了人

^①任质斌：《新四军五师是怎样成长壮大和完成她的历史任务的》，1981年7月24日，《长江日报》。